

激進與保守贅言

● 汪榮祖

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者寄來余英時、姜義華兩教授辯論激進與保守的文章，希望繼續討論此一重要而有意義的問題，要我也發表一點意見。我無辭推卻，且與余、姜兩教授相識，或不以為忤。乃不揣敝陋，草寫此文，略抒讀後的一些隨感，不足以言參與論爭。

難以一概而論的激進及保守

關於激進與保守兩概念有絕然不同的界定與理解，並不希奇，所謂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，蘇東坡題西林壁詩句早有生動的描寫。各人生活環境不同，立足點不同，所見自然有異。就我個人經驗而言，從海外看大陸，常有天翻地覆、面目全非的印象，而生活在大陸的人，反而感覺江山依舊，進展緩慢，即使有所改變，亦有貌異心同之憾。筆者於十餘年前初返大陸之前，所期待的也是巨變後的中國，但半年住下來，深感舊中國的影子愈來愈

長，不變者遠多於變者，尤其在皖南家鄉，明清建築群依舊，歙縣大街還有學士牌坊，還有線裝書可買。景觀固未大變，民風亦樸實如故。毛澤東說，他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」，肯定是刻意「誇小」，絕不確切。但謂1949年以後的「新體制」與傳統已徹底斷層，未免刻意「誇大」新體制的能耐，誰曰可信？相比之下，筆者長大成人的台灣，中國文化傳統卻甚「邊緣性」，且帶有日本人五十年統治遺留的東洋味，傳統文化有隔，外來文化無根，遂有60年代初的「文化沙漠」之譏。說50、60年代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高潮，顯然言過其實，識者皆知此一運動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文化意義。

近代中國思想趨向上的激進，以及社會保守勢力的頑強，可說相映成趣。姑不論激進是否少數知識分子的思想趨向、是否能代表整個思想界（思想界固不僅限第一流的頭腦），事實上，近代中國各期的「時代思潮」（the Zeitgeist）尚待更為深入的思想史研究。不過，大致而言，自戊戌而

毛澤東說，他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」，肯定是刻意「誇小」，但謂1949年以後的「新體制」與傳統已徹底斷層，未免刻意「誇大」新體制的能耐，誰曰可信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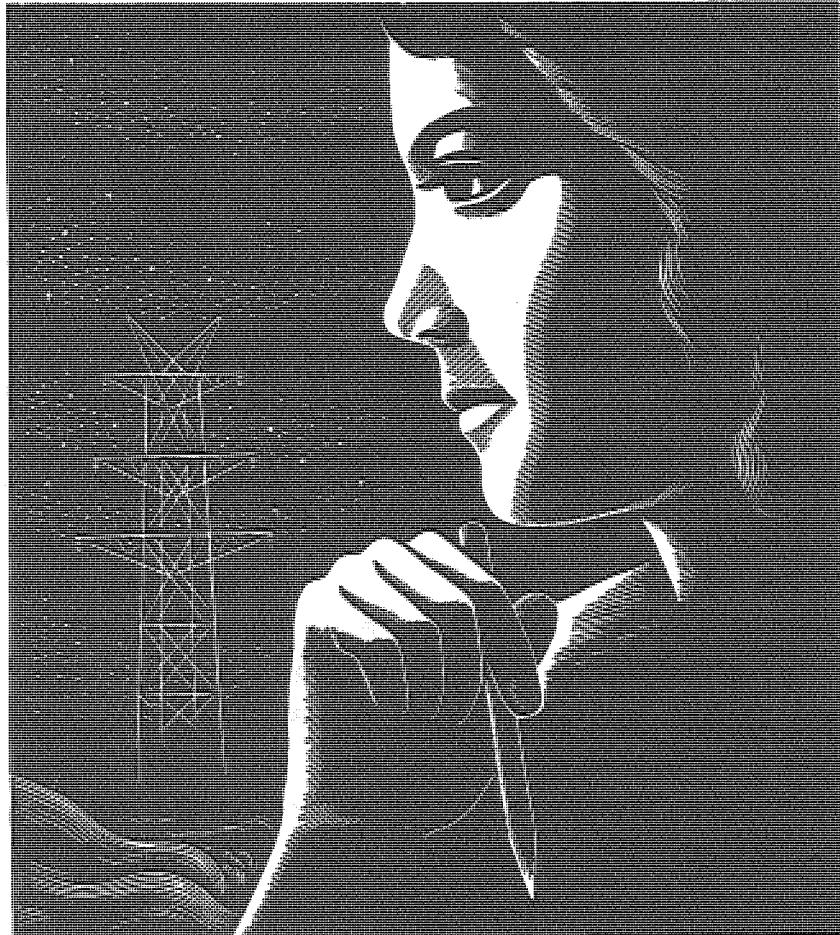
強大的社會保守勢力似乎很有效地牽制(不止制衡)了激進的思想趨向，激進思想之挫折似乎使其愈趨於激進。則近代中國思想趨向之激進，恰與社會勢力之保守成正比。

辛亥而五四，激烈的浪潮確實是一波高過一波，然而在驚濤駭浪之間，社會保守勢力穩坐釣魚船，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即從戊戌變法談起，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在當時當然是甚為激進的，但百日維新，康氏不僅不要推行激烈的君憲，而且擱置開議院的建議，他反而要增強君權以推行新政。為了統籌新政，他祇建議開制度局，至制度局不可開，他祇要開早有成例的懋勤殿，已經不可以言激烈，但仍被保守派包圍的慈禧太后否決，以致於發生政變。就此而言，戊戌變法的失敗，並不是思想趨向上的激進或保守，而是保守勢力為了維護實際利益而拒變。再說辛亥革命，革命思想自較君憲更為激進，推翻了二千年的帝制，激烈思想且見之於行動。但是究其實際，革命的成功實賴各省的士紳、地主、商人(社會保守勢力)為

了自保而紛紛獨立，因而民國成立之後，革命黨的實力微乎其微，以致於有袁世凱以及北洋軍閥的當權。政治革命全不能牽動社會革命。至於五四，雖然涉及思想與文化層面的革命，並促成共產黨的成立與政治革命之再起，但自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，傳統的社會保守勢力或略有量變，絕無質變。據此可知，強大的社會保守勢力似乎很有效地牽制(不止制衡)了激進的思想趨向，而激進思想之挫折似乎使其愈趨於激進。若然，則近代中國思想趨向之激進，恰與社會勢力之保守成正比。反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，傳統社會勢力不僅未阻礙近代化的進展，且助成之，因而其思想趨向不僅不激烈，反而保守，可為旁證。此應為思想史研究上值得注意的現象。

馬列主義確是近代中國最激烈的

我們能否擺脫「激進」與「保守」的概念，努力於前瞻性的創造？



思想。但是共產革命的成功主要由於激烈的馬列嗎？似又未必，此一專題研究者已多，簡單言之，主因不外是國民黨的腐敗與共產黨的武力。馬列主義顯然是1949年後才逐步佔領中國大陸的思想陣地，思想之成功在武力勝利之後，應無可置疑。然而佔領陣地的馬列是否創建了一個切斷傳統臍帶的新體制了呢？美國的漢學界昔有左右二派，左派認為中共集權乃傳統權威主義之延續，右派則認為是俄共體制的移植。經過三、四十年的觀察與研究，一個大眉目還是很清楚的：中國大陸在50年代初一面倒，師法俄共，但50年代中期以後，即實驗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，而且中蘇交惡二十年。許多專家也看出，所謂馬列主義也不是一元的，在不同的國家與文化環境裏，竟亦有不同的發展。這種不同是否與各個不同的傳統有關呢？與此相關的一個具體問題則是毛澤東受到斯大林的影響較多呢？還是受到明太祖的影響較大？答案並不是十分清楚的。俄國漢學家在60年代的見聞，恐怕並未經深入研究，而祇是浮光掠影的印象。

從激烈的革命到漸進的改革

文化大革命，不論其思想趨向上的激進，或心理結構上的保守，其最大的受害者除了中國文化與知識分子外，就是被稱為「邊緣集團」的「新階級」。整個中共成為毛澤東及四人幫整肅的對象。如果沒有文革這場急性盲腸炎，很難想像會有斷然操刀一割的鄧小平改革。其實，改革並非新鮮事，在近代革命中國起步之前，康、梁、嚴復輩早已主張改革，祇是大革

命家如孫中山覺得改革太緩慢，沒有耐心，所謂：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」（見《嚴幾道年譜》）祇是經過不斷革命之後，才回頭走改革之路，未免代價太高。改革既非一味保守，也非盲目激進，似是二者之間的中間路。而且十幾年改革下來，民間社會逐漸復蘇，傳統文化更加受到重視，姓資姓社似已平分秋色，再與十年革命相比，優劣善惡立見。是以，今日我們不管對保守主義有深憂也好，對激進主義有深恨也好，如果為了整個中國着想，整個民族設想，唯有走改革的路，並希望改革成功，達到富強的目標。

誠然，今日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遠走在政治改革的前面，但是經濟改革如不中斷必然會導致政治改革，這也可說是一點台灣經驗。台灣經驗同時顯示，即使在經濟發達後的台灣，民主改革仍然顯得十分艱巨，萬分混亂。此固然由於民主有嚴格的條件，如中產階級，如自由傳統，如普及教育，如法治觀念等等，但也由於在台灣的「邊緣人」統治集團，對民主一直是壓制而非培養：《自由中國》雜誌被封閉了，雷震坐了十年的政治獄；比《自由中國》銷路更廣、影響更大的《文星》雜誌也被封閉了，李敖坐了七年的黑牢（包括雷震未嚥到的酷刑）。最後民主的潮流壓制不住了，祇好放手，遂成決堤之勢，造成朝野上下拳打腳踢的奇異景觀。此一台灣經驗確實值得大陸參考學習。

自由與民主原是西方社會的產物，中國的社會不同，自古以來就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傳統。既無此傳統，當然不會有大多數人認同的民主政治秩序。但傳統應該是活的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今日的新風氣，就可成為

今日我們不管對保守主義有深憂也好，對激進主義有深恨也好，如果為了整個中國着想，整個民族設想，唯有走改革的路，並希望改革成功，達到富強的目標。

今日國學之衰微已到驚人的地步，且其來有自，主要還不是五四以來的激進思想，而是那西式的教育制度。

明日的新傳統。民主傳統更需要耐心地培養與創造，暫不問收穫，但求努力耕耘。同時須知，民主並不是萬靈丹，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；民主雖比獨裁好，但也不十全十美。筆者對未來的中國民主，既樂觀又具信心，但未來的中國民主不可能是西式的。日本乃「非西方」國家中西化最成功的例子，然其戰後的民主，雖由美國強行之，結果仍非完全的西式或美式，而深具東洋特色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有文化的因素存在。

多元文化與國學的前途

說到文化，近代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確認為近代文化就是西洋文化，中國文化只能說是上古或中古文化，缺了一個近代，唯有以西洋文化來填空。此乃全盤西化派的理據，亦即是文化一元論：文化唯有新舊，沒有國界。不過，具有第一流頭腦的章太炎、陳寅恪，以及先師蕭公權等並不以此為然，認為文化是可以多元的，中國文化也可以現代化。他們對傳統文化都有所批評，不能說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，但相對於激進的全盤西化派而言，他們當然是保守的，他們絕對是要想保住、守住中國文化的。顧頡剛提倡疑古，具有相當激烈的一面，似乎是十分消極的，但其最終目的仍是要建立信史，反而是要積極地保守住傳統中國史學。又如民國以來的國學研究，不論概念上或方法上如何激進，其最終目標也是想要保守住國學，否則又何必花時間與精力去整理研究呢？傳統的中國文化必須經過現代的洗禮，早已是歷史的運命。

今日的新風氣，就可成為明日的新傳統。民主傳統更需要耐心地培養與創造，暫不問收穫，但求努力耕耘。

今日國學之衰微已到驚人的地步，絕非無的放矢之言，且其來有自，可說是累積的後果，主要還不是五四以來的激進思想，而是那西式的教育制度。從新式學堂出來的人，愈來愈看不懂古籍，原是自然的事。再加上不斷的革命浪潮，國學在革命的進步人士眼中，不僅可鄙，甚至可恥。文革無疑是革命浪潮的高峰。但是在浪潮盡之後，檢視劫後的國學以及傳統中國文化，也有令人樂觀的一面。例如中醫中藥的現代化，已有相當的成效（當年自由派人士如傅斯年輩是想要根絕中醫的）。民間藝術，如崑曲等已有精益求精的進展，令人有廣陵散未絕之感。至於廿五史與資治通鑑的校點，大量古代文物的發掘與整理，大批古籍的注釋與研究，都可令人相信，傳統文化必將成為今後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，不致會有無法彌補的斷層。文革之後，《管錐編》的問世，不能不說是一大驚喜。作者錢鍾書先生研究十部中國經典，參證西洋名著，精義迭出，實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轉化，提供了範例。這已不再是激進與保守之談，而是前瞻性的創造問題了。

維州柏堡
1992年4月12日

汪榮祖 1940年生於上海，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，獲華盛頓大學博士，現任美國維珍尼亞州理工暨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。汪教授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，主要著述包括《史家陳寅恪傳》、《晚清變法思想論叢》、《康章合論》、《史傳通說》、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-Rejuvenating a Tradition*等及編著多種。